

西方哲学东渐史

XIFANG ZHIXUE DONGJIAN SHI

黄见德 著 (上)



人民出版社

西方哲学东渐史

XIFANG ZHENUE DONGJIAN SHI

黄克明 著 《上》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下)/黄见德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

ISBN 7-01-005703-6

I. 西… II. 黄… III. ①哲学史-西方国家 ②哲学史-中国
IV. ①B5 ②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7187 号

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下)

XIFANG ZHIXUE DONGJIANSHI

黄见德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49.375

字数:1115 千字 印数:0,001-2,000 册

ISBN 7-01-005703-6 定价:90.00 元(上下册)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作者简介

黄见德(1936 —)，江西宜丰人。长期在高校从事西方哲学教学与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客座教授，西方哲学东渐文献馆特聘研究员。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全过程地与系统地论述西方哲学东渐的著作。它主要阐明了西方哲学东渐作为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进程中一种重要文化现象发生的必然性，分析了西方哲学东渐四百多年曲折而复杂的发展历程，评述了这个过程中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活动、取得的成果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指出了西方哲学东渐过程中值得总结的经验与应该接受的教训，揭示了西方哲学东渐发展过程的规律性。这是对业已过去四百多年西方哲学东渐总体面貌的宏观展示，也是对其发展全过程的初步总结。

责任编辑：张伟珍

封面设计：肖 辉

序

张 世 英

黄见德教授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出版过有关西方哲学东渐史的专著,2002年又有《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导论》问世,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下两卷是在前几本著作的基础上扩大、充实、改写而成的。这部著作不是史实的简单铺陈,而更多的是从西方哲学东渐的史实中总结出一些普遍性的规律和经验教训,因而是一部史论结合、理论性较强的哲学专著。作者关于中国哲学在中西哲学交流中所处的历史地位问题的观点,以及关于中国学者在中西哲学交流中的文化心态问题的意见,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在这些方面亦有同感。

黄见德教授指出,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哲学舞台上开展的中西哲学交流”的双方,“一方是西方近现代哲学,一方是中国传统哲学”。西方近现代哲学比起中国传统哲学来“显然属于高一层的哲学形态”,“一为落后,一为先进”,“这两种哲学形态的冲突”,是“两种不同发展程度,或不同时代差别的文化与哲学”之间的冲突,是“两种不同性质与层次的哲学冲突”。^① 作者的这个见识,对于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哲学东渐的态度问题至关重要,我很赞同。长期以来,不少有关西学东渐的观点,

^① 见本书“绪论”,第8页。

就是误把这段时期中两个不同层次、不同时代、不同发展程度的哲学差距,或者如作者所更为简洁地概括的那样,误把“先进与落后的哲学差异”,单纯地看成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民族性差异,是“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之间的冲突,”于是“在弘扬传统的口号下拒斥西方哲学”,^①以致不能“对自己的哲学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正确的总结,以便弄清和确定自己继续进步的起点,并在这个基础上汲取高于自己哲学层次的哲学成果,作为契机进行变革,实现哲学转型,提高自己的哲学层次”,也就是说,不能“汲取西方哲学中反映时代前进的积极成果,变革中国的传统哲学,使之实现转型,并发展成为新形态的哲学”^②。作者在这里明确的告诉我们,中国传统哲学需要变革,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哲学的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需要承认西方近现代哲学在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较量中的先进性和“高一层次”,需要“汲取西方哲学中反映时代前进的积极成果”。

冯友兰早在解放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下册第495页)中说过:“直至最近,中国无论在何方面,皆尚在中古时代……近所谓东西文化之不同,在许多点上,实即中古文化与近古文化之差异。”我在《天人之际》与《哲学导论》两书中也已多处讲到并贯穿了这样一条原则,即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差别,不仅是中西哲学的民族性、地域性差别,而且是古代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时代性差别。但我没有像黄见德教授这样更进而明确地、尖锐地把这个差别规定为低层次与高层次、落后与先进、不同发展程度的差别。我很佩服黄见德教授学术上的胆识。

① 见本书“绪论”,第5页。

② 见本书“绪论”,第8页。

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的这种差别,其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来学习西方近代哲学,汲取其先进成果以提高中国传统哲学呢?两者间的交流具有什么文化上的意义呢?我想接着黄见德教授的话头,就这几个问题作点申述。

我在《天人之际》和《哲学导论》等著作中已多处论述过,西方自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自笛卡儿起到黑格尔逝世的近代哲学,其主导原则是“主体性”,是“主体——客体”关系的思维模式(所谓“主体性”也就是指“主体——客体”关系中主体的特性),这种原则和思维模式已由古希腊的柏拉图哲学开其先河。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都是这种哲学原则和思维模式的产物,而作为西方文化和近代文明之标志的科学,是同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特别是与演绎法密不可分的,也可以说,西方科学之繁荣发达,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有其思想上的根源。和西方近代哲学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以不重主客二分的“天人合一”为主导原则,少有认识论与方法论,更缺少演绎法。中国古代科学之不发达或不甚发达,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特点相应的。与西方近代哲学相比,中国传统哲学显然落后了一个时代,在哲学发展的程度上和前进的步伐上低了一个层次。而自19世纪中叶以后所发生的中西哲学的交流与碰撞,正是这种落后的中国传统哲学与先进的西方近代哲学的交流与碰撞。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显然应是以向西方近代哲学学习为其主要任务,学习其不同于“天人合一”思想的“主体——客体”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与之相联系的“主体性”原则,学习其认识论与方法论,特别是演绎法。

明白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之差距的具体内容,关于怎样学习和汲取西方近代哲学的先进成果的问题也就容易回答了。中国传统哲学由于以不分主客的“天人合一”为主导原则,较

少讲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故具有直观性、朴素性和模糊性的特点:断语(格言、箴言之类的东西)比较多,也比较精粹,富有深意和诗意,但缺少论证,即使有论证,也多系形象性的比喻、类比、类推,有时也有些归纳法,但很少逻辑推理和演绎法,于是一些内容丰厚深刻的哲学断语给后人留下了各式各样的不确定的解释空间。作为诗的语言,这些断语给人以无穷的玩味和美的享受;作为哲学的思考,这些断语则给人留下了难以捉摸的遗憾。西方近代哲学则不然:一个哲学论断或哲学观点,特别是具有创新意义的论断、观点,都有详细的论证和说明,或演绎,或归纳,一步一步的逻辑推理,条分缕析,头头是道。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论断、观点,主要是通过生动的形象性的东西让人感受它,从而接受它,但接受了却不一定能铺陈一大套道理。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些论断、观点,主要是通过抽象的概念,严格的逻辑性来说服人,但说服了却不一定就有内心的感受而心悦诚服。这样说,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在方法上似乎是半斤八两,各有优缺点,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缺乏逻辑的认识方式到重逻辑的思维方式,是人类认识道路上的一个重大的前进性步骤。西方近代哲学重逻辑推理,把哲学弄成了缺乏诗意的抽象概念王国,这个缺点是人类认识史上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缺点就停留在中国传统哲学那种缺乏逻辑论证和理论说明的低层次的认识水平上。而且,西方近代哲学的这个缺点,已在其前进过程中,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方现当代哲学中,愈来愈被揭示而加以克服,西方现当代哲学中欧洲大陆的人文主义的哲学家就特别致力于超越传统的概念哲学,超越单纯的逻辑推理,而企图在近代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上,进而把哲学与诗意结合起来,达到超理性(不是抛弃理性和逻辑论证)的一种更高一级的直观境界。从缺乏逻辑思维到重逻

辑思维再到超越逻辑思维,这是认识史上一个必由的“之”字形道路,而中国传统哲学的认识方法尚处在“之”字形的原初阶段。中国传统哲学要想前进,就必须学习、汲取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使自己走出那种朴素的简单直观的状态。我常常爱用画龙点睛来比喻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近代哲学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差异: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些论断、观点很精辟,很有深意和诗意,好比画龙点睛之“睛”,点得很神,但缺乏论证,龙身只是寥寥数笔,好比漫画和狂草;西方近代哲学,逻辑论证和理论说明很周详,好比龙身画得很精细,是工笔画,但缺乏具有诗意和深意的概括性语言,“睛”没有像中国传统哲学那样点得神灵活现。中国传统哲学在和西方当代哲学的交流中所要做的,就是要进一步把龙身画得精细一点儿,在“画龙”上下工夫,给龙身画工笔画,这正好同西方现当代哲学为了弥补近代哲学的抽象性缺点而在“点睛”上下工夫的情况形成一个对比。我以为中国传统哲学只有这样才能化腐朽为神奇,使自己重新生动活泼起来,走向世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确有很深厚的内蕴和巨大的潜力,但它按其原初的直观形态,在当前的国际思潮中则只能显得是一个“睡狮”,它需要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来激活它,惊醒它,一旦这个“睡狮”被激活、被惊醒过来,它就好比西方近代哲学更具威力和魅力。事实上,19世纪中叶以来的西方哲学东渐的历史,也是西方近代哲学激活、惊醒中国传统哲学的历史。

这里所谓用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来激活、惊醒中国传统哲学的“睡狮”,其实就是要把中国传统哲学中所内在地蕴藏的东西抽绎出来,进行逻辑的分析,并结合现代的实际,作出评判性的解读和新的诠释。如果认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就只能在中国古籍的故纸堆里转来转去,那虽然就研究者个人来说,也可能使

他成为功底深厚的专家,但中国传统哲学中很多可贵的东西却依然只能处于沉睡中。只有既有旧学功底,又有西方哲学的素养特别是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训练的学者,才有可能做好激活、惊醒“睡狮”的工程。当然,要做好这项工程,也并非易事。一是学者本人深受几千年来老传统的影响,不习惯于和不善于做细致的逻辑分析和逻辑推理,中国学者至今仍不擅长于这方面的功夫,就如同西方学者(包括一些人文主义的思想家)至今对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诗意境界仍然没有深入的领会一样,这种本民族传统的影响和作用,即使在国际思想交流日益深广的形势下,也是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的。二是外在的压力。我国思想界至今仍然有一种对西方思想心存疑虑和警惕的心态:讲弘扬传统,可以口若悬河,一泻千里,讲学习西方特别是学习西方哲学,则畏首畏尾,多加限制之词。这种思想上的自我禁锢,如果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中国传统哲学之“睡狮”必将继续处于沉睡之中。

前面已经提到,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比起中国传统哲学来,在时代性差异上,具有“高一个层次”的优越性,但它本身的抽象性的缺点有待克服和超越。与此相联系的是,西方近代哲学,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差异也有同样的两面性:既比中国传统哲学高出一个时代,又有其本身的缺点有待克服和超越。

西方近代哲学由于其“主体——客体”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主体性”原则,而使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是其文化方面的优胜之处,但它忽视了古希腊的人与自然融合为一的审美境界,这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片面性,也是其文化方面的缺点。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一些近代哲学家、思想家,例如赫尔德、黑格尔等人都对古希腊有羡慕、怀念之情。而古希腊这种审美境界,正如黑格尔所说,是

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的“实体性的合一”亦即不分主客的“天人合一”境界相似相通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境界对于西方近代哲学来说,亦有其优胜之处。从文化发展的程度和前进的步伐来讲,中国传统哲学不重主客二分,从思想上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以致中国传统文化落后了一个时代,低了一个层次,但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又有点像马克思赞赏古希腊艺术、史诗所说的那样,虽已过时不能照搬,却仍有“魅力”。科学与审美都是个人性性和人类文化活动不可缺少的方面,而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所发生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却发生了明显的矛盾。有的人出于保持和爱护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和审美文化的动机,而一味贬斥科学本身,以致反对近代哲学的“主体——客体”关系和“主体性”原则,主张以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代替西方近代的“主体——客体”关系和“主体性”原则。这种观点显然违背了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违背了时代前进的步伐。发展科学是时代的要求,是当今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之所亟需。我们绝不能牺牲科学发展而退回到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那种不分主客的、原始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去。西方近代哲学家虽使得像黑格尔等人那样有怀念、羡慕古希腊的人与自然合一的故园之情,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并没有退回到古希腊,而是超越近代哲学自身,进入现当代哲学,把科学所要求的“主体性”与审美所要求的“主客融合”两者结合起来。中国在科学方面已经落后于西方,从而在整个文化发展的道路上也落后了。为今之计,我们只有在科学发展上奋起直追,而又吸取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走超越科学之路,即在发展科学的同时,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境界的优点,使之融科学与审美为一体,这才是当今我们民族的思想文化发展应当遵循之路。

我在《新哲学讲演录》等著作中已多处申述过,个人精神意识的发展过程包含高低不同的阶段,大体上说来,最低级的是一种求得个人欲望满足的阶段,较高的是以追求客观事物的因果性、规律性之类的秩序为满足的阶段,再高的是以满足人自身的意志追求的阶段,最高的是审美追求的阶段,我把人对万有相通、万物一体的领悟看作是审美追求的极致,只要人对万物一体之“一体”有一种敬畏、崇拜的感情,那就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宗教感情,我认为这是一种无神论的宗教感情。这样,人生的境界也就可以相应地按高低层次分为:(1)“欲求的境界”;(2)“求实的境界”;(3)“追求社会理想的境界”(包括“道德的境界”);(4)“审美的境界”(又称“诗意的境界”),其极致是“宗教的境界”,我指的是上述那种无神论的宗教境界。每个个人都是上述几种精神境界的统一体,但各种境界在不同人身上所占的比例关系不一样,有的人以最低级的欲求境界占主导地位,有的人以最高的诗意境界占主导地位;在同一个人身上,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也有比例关系之不同,同一个人有时是以最低级的欲求境界占主导地位,有时是以最高的诗意境界占主导地位。理想的人格是以最高的精神境界占压倒优势的人。

和个人精神境界的高低层次相应的是,人类文化活动的活动过程也可以分为高低不同的阶段。撇开原始的人类文明低下的阶段不说,人类文化活动的初始阶段是科学(包括其萌芽状态在内),较高的是道德,再高的是审美,审美的极致是宗教(还是指我所说的无神论的宗教)。语言当然也是人类的文化活动,它是最基础性的文化活动,故有科学语言、道德语言、审美语言(包括诗意语言、宗教语言)之分,这里不拟做语言方面的讨论。一般说来,一个民族也是文化活动的上述各个方面的统一体,但和个人精

神境界一样,各种文化活动在各民族中所占比例关系不一样,在同一民族中也随着时代的迁移而有不同的比例关系: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审美(如道家的审美文化)和道德(如儒家的道德文化)占主导地位,科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一直没有重要位置。不过由于时代的进步,特别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传统文化不重视科学的局面已经越来越改观了,当前甚至发展到需要批判科学至上主义的地步。在西方文化中,以宗教与科学占主导地位,道德以宗教为基础,包括在宗教之中,审美居于次要位置,不过自康德强调审美的独立自主性以来,其在西方文化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了,现当代的欧洲大陆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们正努力从事超越科学、融科学于审美的的工作。

从中西文化的民族性差异和地域性差异的角度来看,中华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之处,从总体上说,主要表现在科学上,而科学落后的总的思想根源(当然还有经济的、政治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传统哲学重不分主客的“天人合一”,缺乏“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哲学上的这种落后性,使得中华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审美和道德基本上都处于一种前科学的状态、前主客二分的状态。不过审美道德不同于科学。审美,正如马克思评论古希腊艺术所说的那样,过时的东西至今仍可有“永久的魅力”,我想,道德也多少有类似的情况。中国古代的审美文化和道德文化特别是审美文化,虽已过时,却至今仍然对我们具有“永久的魅力”。而且,审美与道德比科学更多地具有民族性特色和地域性特色,不可单纯地以时代性差异来评判其高低,而更多地应是中西古今相互辉映。在此种意义下,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和道德文化对西方现当代人亦应有其“魅力”,例如中国道家所讲的人与自然融合为一的“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儒家所讲的“民胞物与”的另一种“天

人合一”的境界——道德境界,就值得当今的西方人鉴赏和借鉴。在西方哲学东渐的过程中,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西方引进的,主要应是其近代哲学的“主——客”关系思维方式和“主体性”原则,是其认识论与方法论,以及在此哲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近现代科学,而我们民族可供西方借鉴的,主要应是上述道家的审美境界和儒家的道德境界。我这里都用了“主要”二字,就不是惟一的意思。

当然,我们仍然不能忘记我在前面所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审美与道德,毕竟基本上是前科学的、前“主——客”关系的。从我们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来说,我们尽管承认这种前科学的文化至今仍保持其“魅力”,但毕竟过时了,我们更应该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把我们传统的审美文化、道德文化提升到超越科学、超越“主——客”关系的境地。我常常讲,现时代的诗人不可能再是消极顺应自然,“箪瓢屡空,宴如也”的田园隐士,而可以是忙碌于高精尖的科技园里的积极进取之士。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要紧跟时代,提倡一种既包含科学技术在内而又超越科学技术的审美境界和审美文化。我国传统的道德境界和道德文化是封建主义的,它把道德看成是天理而与人欲绝对对立起来,与主体认识客体、征服客体的功利追求绝对对立起来,这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显然也是迂腐过时的观点。我们需要发展科学,以满足功利的需求,我们今天所应该提倡的道德境界和道德文化,只能是既包含科学所提供我们的功利需求方面的满足而又超越之,而绝不能以天理灭人欲,只讲道德,不讲科学。总之,科学与审美、与道德是相通的,我中华文化未来发展的趋向,应是既享受科学所带来的福音,又有“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精神境界的审美文化与道德文化。

中华传统的审美文化与道德文化,由于基本上是前科学的、前

“主——客”关系的,所以超越科学、超越“主——客”关系的问题在近代以前尚未提上日程。超越的问题主要发生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近现代,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科技事业日益繁荣发达,西方早已在先进的科学基础上所产生的超越科学、超越“主——客”关系的审美文化与道德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涌入中华大地,这才使我们民族的审美文化与道德文化不能停留在前科学、前“主——客”关系状态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需要亦步亦趋地把西方的现当代审美文化与道德文化(包括宗教)照搬过来。我们需要赶上时代的步伐,学习西方的科学,学习西方的“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和“主体性”精神,而又超越之,但我想再重复一下上面所说过的,审美与道德比科学更多地具有民族性特色,不可单纯地以时代性差异评判其高低。所以,我们当今在超越科学、超越“主——客”关系的审美文化与道德文化方面所下的工夫,应该是更多地继承和发扬我中华传统的审美文化与道德文化的特点和优点(当然也要借鉴西方现当代的审美文化与道德文化),把西方的科学、“主——客”思维方式和“主体性”精神纳入中华文化,使二者融合为一,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超科学、超“主——客”关系的审美文化与道德文化,包括创造出这样的新的哲学体系。只有这样,中华文化才能既在时代性方面赶上西方现当代文化,又能保持中华文化的民族性特色,而与西方现当代文化并驾齐驱,与之作平等对话。

中西思想文化一般都有一个从主客不分到“主——客”关系又到超越“主——客”关系的阶段性发展过程,这是一种时代性的前进过程,但处于大体上同一阶段的中西思想文化又有各自的民族特色,不仅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而且在前进的步伐上、时段的长短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例如西方近代思想家黑格尔等人所羡慕、

怀念的古希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融合为一体的家园,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就不能一概而论。同理,今天我们讲超科学、超“主——客”关系的审美文化和道德文化,也不能照抄西方现当代的超科学、超“主——客”关系的文化模式。总之,在对待中西文化交流的问题上,在对待西学东渐的问题上,我们既不能把时代性的差距看成是民族特色上的区别,以保持中华民族性特色为名,为本民族文化的时代性落后作辩护;也不能把本来更多地具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单纯地看成是时代性差距,以弥补时代性的差距为名,抹杀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当然,民族特色也不是没有先进与落后的时代性区分,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民族特色中一些落后的、缺乏生命力的成分会越来越被淘汰,其中有生命力的、先进的东西会越来越发扬光大,其结果或将是时代性比民族性更占突出地位,于是“民族性的差异会越来越小”,“人类的共性会越来越显著”。^① 我以为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世界大同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而且,即使在理想的大同社会里,文化的民族性差异也必将保持,世界大同的社会应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无论如何,弄清时代性与民族性的这种种复杂关系,应是我们思考中西文化交流、思考西学东渐问题的关键。

2005年4月16日

^① 见本书“结束语”,第785页。